

【美】艾·恺 著
王宗昱 译
冀建中

最后的儒家

——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当着中国的文化精英向传统展开史无前例的无情批判时，梁漱溟却看到了传统的新的生机。作为本世纪新儒学的开山祖师，他使儒学有了包容域外文化的胸怀。他的思想品格和事功都已不复见于后辈儒者，但是他70年前的视角一直支配着后人的思考。

【美】艾 恺 著

王宗昱 译

冀建中

本书特约责任编辑委 杨润时

最后的儒家

——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

江苏人民出版社

书 名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
著 者 [美]艾 恺
责任编辑 孙 立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通州市印刷总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75 插页 2
字 数 308 千字
版 次 1996 年 3 月第 1 版第 3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1133—6/Z·76
定 价 13.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迫切需要理论上的借鉴与创造。为此，我社在优先出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关于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著作的同时，也适当选择一些海外学者研究中国的较有影响的著作出版。海外学者占有的丰富资料，他们的研究视角和某些方法，对我们认识中国的国情，评估中国文化的传统、心态及其前景，从而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的建设，都有着启迪和借鉴意义。当然，他们的著作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甚至同我们存

在着某些原则分歧,这是需要读者加以认真审察和辨识的。同时,任何借鉴都代替不了自己的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要靠我们自己去中国当代的实践中去概括和总结。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丛书只求为此提供某种有益的参照和比较。如果这套丛书能在这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将感到欣慰。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2年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列强的船坚炮利迫使中国人逐步地改变关于世界秩序的古老观念，却远远没有改变他们反观自身的传统格调。50年代以来，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的中国研究却有了丰富的成果，以致使我们今天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需要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不仅要向国内读者译译海外的西学，也要系统地输入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可能会加深我们100年来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它的学术水准也再次提醒：我们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过去那些粗蛮古朴、很快将被中华文明所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高度发达的、必将对我们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

动的文明。也正因为这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古老的中国警句便仍然适用，我们可以借别人的眼光来加深自知之明。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从几代学人的成果中撷取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或见解时，我们自然不能从各家学说中只挑选那些我们乐于接受的东西。如果那样做，这“筛子”本身就使读者失去了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但这次译介毕竟只是初步的尝试，成败利钝，欢迎论评。

丛书编委会 1988年

中文版序

艾 恺

王宗昱先生研究梁漱溟先生的哲学思想有年，曾主持了《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的编辑工作，现在又与冀建中女士合作译出了拙著《最后的儒家》，并来信嘱我作序。

在人们的脑海里，梁漱溟有四种形象：哲学思想家、乡村建设运动领袖、政治上的中间派，以及50年代知名的受害者。

不过还有一点应予补充，他也曾就此提醒过我们。他自谦地说，“我不是学问家而是实干家”。这是他的独到之处。他不同于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从不“坐而论道”；他总是思考着社会问题，一有所悟便去力行。此外，他自己还强调过，也无人可以否认，他是表里如一的人，其思想和道德是一致的。

当只有二十几岁的梁漱溟成名时，正值具有重大意义的“五四”时期。对于这个时期，各国史学界无例外地给予重视。然而梁漱溟虽是该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却例外地没有像别人那样受到注意。不单在中国是这样，美国亦然。

美国史学界研究中国史起步较晚，直至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方面的著作尚付阙如。华裔学者周策纵60年代写了The May Fourth Movement（《五四运动》），才提到梁漱溟，但也只有一页半，仅限于介绍梁漱溟早年作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迄今为止，拙作是唯一的梁漱溟评传。稍晚的梁启超、胡适、李大钊、鲁迅等，都有人作了传记，甚至不止一种。美国人认为胡适是“五四”时期的主要思想家，这和胡适与外国联系不无相关。外国人容易知道他、理解他。胡适、李大钊和梁漱溟是同时代的人，而且李氏和梁漱溟还是好友。美国人在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时，首先注意到了李大钊。这当然不难理解，人们自然会注意站在左右两翼突出位置的历史人物。

梁氏终生被看作近代中国的保守派，或者“文化守成主义派”，且又不属保守派中的最杰出者。说到“五四”时期，人们可能提出梁启超、张君勱或某个人为保守派的主要代表。梁漱溟的思想在当时（“五四”）已被评定为保守，赞同他意见的人寥寥无几，多数人则不免先入为主地予以忽略。

作为40年代政治中间派的关键人物，梁漱溟往往鲜为人知。张君勱常被看作起主要作用的人物。张氏研究西方政治，又于1953年写了 *Third Force in China*（《在中国的第三势力》）的英文专著，并领导着一个中间派的民社党，因而大家知道他的作用。梁氏说过，他的参预政治，完全是为了调解国共冲突，一当国共冲突已无可避免，便决意退出现实政治。这和许多人的涉足政治很不一样。

在50年代受到粗暴批判的人相当多，不过情形并不一样。例如胡适，对他的批判甚猛，但他却身居海外，不受触动。梁漱溟则不然了，只因他具有罕见的定力，抓住一次次政治运动的间隙，才完成他的《人心与人生》及其他相关的哲学著作。他后半生的著作，由于政治上的禁忌，几乎是在他辞世前不久才得以出版。这既可庆幸又可惋惜。

我研究梁漱溟先生既与偶然机遇有关，又和个人性格有关，也和美国史学界研究中国逐步深化的总体趋势分不开。费正清先生在美国是研究中国的泰斗，他对中国的研究是从西方文化和历史

学进入中国并影响到中国开始，渐进深层，直至研究中国本身。进入五六十年代，受他的影响，我们这些研究中国的后学，大体上也是这样一个路数。

60年代初，中国集中批判杨献珍和周谷城。颇为偶然地，这却成了我研究梁漱溟的机缘。在阅读那些批判文章时，我第一次看到梁漱溟这个名字。当时台湾不允许公开出版梁漱溟等身居大陆的学者的著作，而在台港探访梁漱溟早年的学生时，他们也不知道老师的现状。我是在美国和台港搜集梁漱溟的资料的，可见封锁还是很有效。

在美国的图书馆中虽然有关于梁漱溟的资料和他的一些著作，但学界对他实在很陌生。只是在《最后的儒家》出版以后，注意他的人才渐渐多起来。例如费正清在第三次再版《美国与中国》(The U.S. and China)时，便加进了有关梁的述评。

我曾于1973年首次访问中国大陆，那时正着手撰写《最后的儒家》。一到北京，我就多方打听梁先生，渴望见到他。但是每一个被问到的人都难以回答。1980年夏天，我终于如愿见到梁先生，使我惊喜的是，他几乎与我想象中的那个人相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梁漱溟的表里如一，读其书如见其人。只是到了这一天，我才确信自己成功了：我的书抓住了梁漱溟思想的要义，反映了他的人品。

在约半个月的访谈中，我发现在拙著中有少许事实出入，这在第二版中都得到了纠正。

此后我多次访华，和梁先生又长谈过一次。不过，我把大部分精力用于在山东邹平作长达数月的实地访察，了解当年在这里实验乡建理论的经过和成效。

梁先生过世后，我觉得，我对他的评价应作一些改动。现在看来，我对他所提出的世界文化三个路向和乡村建设理论的意义评价偏低。通常，一件事做成了，人们会说那是对的；一件事没有做

成，人们就说那是错的。但是并非任何事都宜于根据我们眼见的成败去认识和估量。多次去邹平后，我觉得，本来是他对了。他提出的确实是建设中国的长期方案。

我愿借作序的机会解释一下——为什么称梁漱溟为“最后的儒家”。在近代中国，只有他一个人保持了儒者的传统和骨气。他一生的为人处事，大有孔孟之风；他四处寻求理解和支持，以实现他心目中的为人之道和改进社会之道。

梁漱溟是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他的思想在当下不易为人们所接受。不过，一百年后回顾 20 世纪中国的思想家，或许只有他和少数几个人才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为历史所记住。

目 录

中文版序

导 论 1

- 第一章 父与子 15
第二章 精神变态、自杀、成圣 33
第三章 北京大学的孔夫子和文化 67
第四章 中西文化(一) 80
第五章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社会反应 127
第六章 梁漱溟在探索一个纲领,1922—1926 137
第七章 广东与河南:乡村重建的开端,1927—1931 158
第八章 中西文化(二) 182
第九章 乡村重建:儒家的现代化 199
第十章 南京10年之乡村建设:一个政治和社会的分析 234
第十一章 山东的乡村建设 246
第十二章 抗战时期和战后:政治和论战 286
第十三章 回到北京 326
第十四章 1986年跋 341
-

参考书目 357

导 论

“我看你满身臭气！”毛主席突然夺去发言者的麦克风，对他发出一连串声色俱厉的痛骂^①。瓮声回响的北京怀仁堂陷入了一片紧张沉寂的气氛中。这是1953年9月的一个下午，聚集在怀仁堂的几百人正惊愕地盯着讲台，在座的人几乎从未见过主席如此放纵地发怒。毛泽东对这位身材弱小、衣着旧式长衫的人出言不逊，并且在公众面前表现出如此空前的愤怒，其目的何在^②？毛泽东指着这位戴眼镜的矮个子的面孔继续说道：

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先

^① 这次事件发生在拥有63名成员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期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也列席了这次会议。本书的描写主要取材于〔424f〕和〔194〕(pp. 434—436)。毛泽东谈话的内容是经过剪辑的，并且加以说明是“主要部分”。公诸于世的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在此次会议之前的两个发言的合并。这篇谈话极不连贯且有重复之处。唯一一篇由目击者作的报道(〔194〕, pp. 434—436)更增强了这种嫌疑。并且，《毛泽东选集》注明的也是一个连续的日期(9月16日至18日)，这种处理通常是说明一篇谈话不是在一天里作的。

^② 据说，毛泽东有时也在党内会议上发脾气；但从未听说过他在这种公开场合也勃然大怒，出言不逊。由此看来，他对梁漱溟的这种攻击是罕见的了。

2 生是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捧。……他们都是你的密切朋友，……他们那样高兴你，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你梁漱溟的功在那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中国的海伦——艾恺注）还美^①。

甚至在25年后官方出版的《圣经》似的《选集》中，虽然作了一些删节和文辞上的润饰，但毛泽东对梁漱溟的评论的后半部分却表现出更为激烈的训斥。梁漱溟提出的任何问题都只能成为那些新奇讽刺的借口。

梁先生“要求多知道一些计划的内容”。我也不赞成。相反，对于梁先生这种人，应当使他少知道一些机密，越少越好。梁漱溟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可以让别人多知道一点机密，对你就不行。召集比较小型的民主党派的会议，也用不到你梁漱溟参加^②。

毛泽东继续骂道：“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

显然，正是由于梁漱溟先发表了一次演讲才招来了毛泽东的谩骂。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他也曾大胆地攻击过政府采取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决定。因为这样就把最沉重的负担压在农民身上，从而使城市工人事实上成为一个特权阶级。政治协商会议主席周恩来

① [424f], pp. 107—108. (注释标号书目详见本书第357—393页“参考书目”。中译者注)

② [424f], p. 108.

当即对梁漱溟的这次演讲作了强有力的回击，而毛泽东则是喃喃自语并且看上去很恼怒。由于意识到自己已引起了国家最有权力的人的愤怒，梁漱溟要求允许他再作一次发言。

也许最好是把梁漱溟先前反对政府的评论理解为古老传统中的清流之勇。梁漱溟同“皇帝”的争辩完全是出于为朝廷考虑。那天，可能历史学家吴晗也在场。他很可能从这一情景中获得了创作著名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灵感。这出道德剧的主人公海瑞也是农民在朝廷上的代言人。像梁漱溟一样，海瑞“过着一种朴素的生活，是一个正直的人，并且坚持原则……从不妥协。他既不为暴力威胁所屈服，也不为失败所动摇。”^① 善哉！梁漱溟既然扮演了一个孤独而不畏缩的农民代理人的角色，表现了道义上的英雄主义，并且由此而声名大噪，那么他为什么还企图再讲一次呢？

梁漱溟刚一开口，毛泽东就打断了他的第二次发言。但梁漱溟的第一句话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我再一次发言，是想考验一下自己”。^② 这是他一生经历过的这种考验的顶点，并且也许是儒家传统最后一次有意识的公开表现。因为梁漱溟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儒家传统主义者，而这一姿态则是儒家学说的尾声。梁漱溟同这个世纪最重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鲜为人知的对抗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这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居高临下的，是中国未来的化身；而这个儒者则是微不足道的，是历史的幽灵。但是，那天两人的举止至今仍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毛泽东对那种不雨之雷的传统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应？为什么梁漱溟如此强迫自己去坚持他那无望的主义？

① 吴晗：《海瑞罢官》，第5页，引自〔458〕，p. 30。

② 〔194〕，p. 435。

对梁漱溟性格和经历的几点评价

梁漱溟对自我克制和人格完整的不可遏止的关心是具有传奇色彩的。他的一生是为了实践他感受到的道德使命不断斗争的一生。人生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它要时刻同道德懈怠的危险不断斗争。这种道德的强制力使他形成了非常严肃的个性。他很少笑，甚至很少微笑，也从不开玩笑^①。但他对人并不冷淡。众所周知，作为一个贤人，他对人经常躬着身躯，像个大写的S。1956年，一位共产党的批评家曾这样评论梁漱溟：他“常以‘天生德于予’的圣人自居，这不是很多人都知道吗？”^②

5 自然，有人会感到这种伪善是俗不可耐的。然而，孔孟一类圣人不是时时在宣扬那种似乎是伪装的神圣和不懈吗？没有人否认梁漱溟是属于一种非常特殊类型的人。大大的光头，像钢一样深邃宁静的眼睛，倔强不屈的嘴唇，低沉但是坚定的声音，所有这一切塑造出了一个安静的、沉着有力的形象。一些钦佩他的人回忆道：他那由于沉静而发出圣洁光辉的风采使人感到仿佛置身于“一尊菩萨像”前。另一个人写道，梁漱溟“是那样地令人敬畏，以至他的学生在他面前难以顺畅地说话。”^③

① 我对梁漱溟外貌衣着的了解是根据他的照片以及他的朋友的亲口介绍。至于对他性格人品的了解，有一些也是得自与他的故交的广泛的谈话。

② [101], p. 36。作者在说这些话时，很可能也是以梁漱溟和毛泽东的争吵为背景的，因为他所引用的孔子这段脍炙人口的话（见《论语》VI:22）和这位大师的一段广为流传的故事有关。当孔子在大树下教导他的弟子时，遭到官吏桓魋的密使的追击。来者将大树拔起，欲杀孔子。弟子们都催促孔子逃命。孔子却很坦然，他坚信自己的圣贤身份和肩负的天赐使命。他从容地用上面这些话安慰学生。这段话的后半部是：“桓魋其如予何？”

③ [613]; [311]。

关于梁漱溟的经历和成就的评价是多种多样并且相互矛盾的。他的一生漫长而且复杂；他的一生是曲折的，几乎经历了 20 世纪中国所有的主要事件和运动。他的事业和著作几乎触及了本世纪上半叶中国所有的重大事件。与胡适、吴稚晖这些“五四”时代大多数反传统观念的同代人相比，他是与西方唯物主义相对立的中国唯灵论的笨拙的保护人，是中国的泰戈尔。他在 30 年代乡建运动中的一些受过外国教育的同事曾傲慢地认为：他具有献身精神，但却是“非科学的”。他那个时代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他和他的纲领是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毫不留情地到来之际，农民封建氏族社会在观念上的最后挣扎。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他被描绘为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妄图通过反对工业化而保持中国的软弱，并且同西方帝国主义有着密切联系。在台湾，他既在教科书中被引用，又被作为一个受共产主义欺骗的人而受到谴责^①。

梁漱溟和中国的文化守成主义者

6

在所有的评价中，梁漱溟都被认为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或“传统主义者”。其理由是各种各样的。从他洋溢着热情的儒家学说到他那甚至在酷暑里也穿着的学者长衫，我们都可以找到上述称号的根据。但概括说来，梁漱溟主要地是被看作一个“文化上的守成

^① 其例请见〔309b〕；〔580〕。关于他的同事对他的看法，取材于〔612〕；〔615〕；〔618〕；〔629〕。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有：〔597〕，pp. 1—106；〔144〕；〔523〕；〔455〕。台湾和大陆最近的评论有：〔409〕；〔101〕；〔532〕。由于梁漱溟在抗战前、抗战期间以及此后的政治活动，台湾和国民党有关的各方面人士在谈话时都把他称为“同路人”。除了 1971 年至 1973 年这段时间以外，梁漱溟的著作在台湾是一直被允许重版的。